

石迹耿千秋

——回忆李四光

许淑彬 李 林



石迹耿千秋

——回忆李四光

许淑彬 李 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封面画：王为政

石迹耿千秋

——回忆李四光

许淑彬 李 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4.125 插页4 字数82,000

1978年4月第1版 197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78·3019 定价：0.34元

出版说明

李四光同志是我国杰出的地质科学家、科技战线上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敬爱的周总理对李四光同志的一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号召我们向李四光同志学习。

李四光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工作，足足五十多年。五十多年里，他经常跋山涉水，奔波野外，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也到了欧美许多地方。在李四光的住所，至今还陈列着他从各地采集来的许多石头标本。想起李四光一生不避艰险，同各种坚硬的石头打交道，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探明了许多地下宝藏；为地质科学创建了崭新的学说——地质力学，人们常常深有感触地把那些石头标本，看成是散布在他光辉道路上闪耀着晶莹光芒的一粒粒宝玉，也象是他为我国科学工作者铺砌光明大道的一块块坚实的石块。李四光同志早先曾经为悼念一个好同学写过这样的诗句：“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用“石迹耿千秋”这句诗来总结李四光的一生，不也是十分贴切的吗！因此，我们就把这句诗，作为这本回忆录的书名。

本书的两篇回忆文章都是记述李四光同志战斗的一生的。文章质朴无华，从亲人的角度，具体地介绍了李四光的生

活道路和革命精神，读来使人感到分外亲切。

《回忆仲揆》的作者许淑彬是李四光同志的夫人。这篇文章是她怀着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限感戴，和对敬爱的周总理衷心感激的心情写出的。当时，她已有七十多岁高令，并正遭受着癌症的折磨。写完此稿的下一年，她就与世长辞了。她写此稿时，曾得到李四光同志生前友好和学生宋应、肖琪、杨钟健和孙殿卿等同志的鼓励和帮助。

《力量的源泉》的作者李林是李四光同志的女儿。她把在“四人帮”猖獗的年代不能也不愿拿出的她母亲的遗稿，加以整理公之于世，自己并忠实地写出她对于父亲印象最深刻的东西，作为母亲遗稿的补充。

在“四人帮”猖獗时，和人民喜闻乐见的许多文艺花朵一样，“回忆录”等带有传记性的文学品种，在不许写真人真事的紧箍咒下，也被扼杀了。因此，这本书的出版，本身就是粉碎“四人帮”大好形势的产物，同时也是对“四人帮”的一种批判和控诉。

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地质总局及有关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目 录

回忆仲揆	许淑彬 (1)
序言	(1)
童年生活	(2)
留学日本	(3)
留学英国	(5)
“破裤子先生”	(7)
创建地质力学	(11)
关于冰川的争论	(16)
在南京的苦恼	(20)
出国讲学	(22)
抗日期间	(25)
回国前后	(36)
战斗的晚年	(43)
养病的时候	(51)
入党以后	(57)
最大的幸福	(61)
“我真愿多活几年”	(63)

力量的源泉

——回忆我的父亲李四光	李 林 (71)
一	(72)
二	(79)
三	(91)
四	(96)
五	(101)
六	(118)

回 忆 仲 揆^{*}

许 淑 彬

序 言

我和仲揆结婚相处共四十八年零四个月。他生前的一切我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的逝世我是无比悲痛的。我难过的不只是因为失去了我共同生活近五十年的亲爱的伴侣，更重要的是想到他还没有如愿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对此，他在临终时也感到无比遗憾。

仲揆的一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生；又是奋斗不息，永不停顿地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一生。特别是在晚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英明领导与亲切关怀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科学研究工作，使他用毕生精力创建起来的地质力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得以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敬爱的周总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原地质部

* 李四光同志号仲揆。

的同志们说过：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入党晚了一些，政治上不是动动摇摇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你们要学习他。现在，我将自己所能记忆的写成这篇回忆录，就是为了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向仲揆学习，也供同志们参阅。

童 年 生 活

李四光同志生于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湖北黄冈县人。原来的名字是李仲揆，为什么又叫李四光了呢？其中有一个小故事，这就需要讲他的童年历史。

仲揆的祖父母是蒙古族。在祖辈一代家境贫寒，祖父早年去世后，祖母就带着他的父亲沿途乞讨，流落到湖北黄冈回龙山，在那里找到一个小破庙住下。当时还是科举时代，他父亲年少时，靠打柴度日，晚上自己读书，后来考中了秀才，就找了一个大一点的破庙，招了十几个学生教书。

仲揆的母亲是汉族人。仲揆五、六岁时，就打柴供家里烧火用，有时还出卖柴禾补贴家用。这样的生活一直过到十二周岁。在仲揆十二周岁那年，他母亲用出嫁时的衣服给他改做了一件棉袄，让他穿着这件衣服、拿着向邻居借来的路费，到武昌报考武昌高等小学*去了。

他投考时，试卷答得很好，得到了第一名。但是考场上的主考先生们看见第一名是一个穷孩子，没有靠山，就不大愿意

* 所谓武昌高等小学，和现在的小学是两回事。它可以选拔成绩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

录取他。幸而其中有一位学校里的先生是仲揆父亲的学生。他对主考先生们说：他是我老师的儿子，很聪明，读书很用功，还是录取吧。于是仲揆才能进入这个学校。旧社会就是这样，穷人家的孩子是没有权利读书的。

入学后，学膳免费，每月还发七两银子。这样，他家里虽然缺了一个劳动力，生活还是得到了一些改善。武昌高等小学每月考试一次，每次考上前五名的都可官费送到英、美、法、德或日本去留学。仲揆入校三个月都是考的第一名，但是因为学校当局看不起穷孩子，所以一直没有送他留学。他气愤不过就跑了。学校当局把他抓回去，要他赔偿三个月的学膳费和廿一两银子的补贴。他哪有这笔钱来赔偿呢？就质问学校，为什么三个月都考上了第一名，却不送他出国留学？学校当局实在无理，但还是硬要他再学习一年，然后送他去日本留学。这样他才结束了武昌高等小学的生活，从此也就离开了家乡。结束了他的童年生活。

出国到日本填护照表格时，他在姓名一栏里错填了年令，写成“十四”两个字。当时这张表是需要花钱买的，他花不起钱再买一张表，只好把“十”字改为李字，把名字写成“李四”；但一想叫“李四”太不好听，就又在“四”字后面加了一个“光”字，认为四面都有光明，这意思似乎还可以。从此以后，虽然朋友们仍称他仲揆，在同学中就称他四光了。这就是李四光名字的由来。

留 学 日 本

仲揆去日本是一九〇二年的春天。因为发的旅费有限，

他买了一点简便的行装和一张统舱船票，就出国了。

乘统舱的客人白天都得挤在船底，热得满身是汗，晚上到甲板上去睡觉，又冻得浑身发抖。仲揆离家乡时，乡亲们给他钱行，吃了一些甲鱼。他从来没有吃过大荤，这次吃了甲鱼，消化不了，就开始泻肚子，到了日本，还泻个不停；又因为没有钱，一直不能去医院。幸而有两位中国同学，借了钱给他才去治了病。他得的是痢疾，日本当局把他作为传染病，放在传染病院隔离起来，经过一段时间才慢慢好转，但是还经常要复发。日本医生嘱咐他，以后不要再吃荤，因此他就吃了一辈子的素。后来，最多也只吃一些蛋和鱼，因此有人开玩笑，说他只吃不会叫的东西。

在日本时，因为要照顾家中生活，负担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的学膳费用，仲揆在生活上就尽量省吃俭用。他经常自己把生米放入暖瓶中，注进开水，经过一夜泡熟成粥后当饭吃，吃菜也只吃点咸菜。这样，比在学校食堂或在房东家包饭，要节省得多。

在日本，开始他进的是宏文学院，后来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造船机械。那时，日本和学校当局歧视中国学生，尽管仲揆考试经常名列前茅，可是从未得到过奖金的优待。那种优待，只有日本学生才能享受。

仲揆在日本时就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一九〇五年在东京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一次孙先生曾摸着仲揆的头说，“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因为他年纪小，只分派了一些贴标语的工作给他做，但在他稚嫩的心灵中，已经播下了革命的火

种。

一九一〇年春，仲揆从日本回国。开始在上海一个兵工厂里任工程师，以后又到武昌工业学校任教师。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了，仲揆毅然参加了革命行列。

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各方面都很不彻底。一些封建豪绅、官僚政客摇身一变，成了革命人士；新上台的资产阶级统治者相互争权夺利……这一切使仲揆深为不满，他再也不愿同那些官老爷们应酬往来了。于是就辞去了实业司长的职务，要求再次出国留学。当时是军阀黎元洪当临时总统，他怕青年知识分子造反造到他的头上，就尽量送他们出国留学。因此仲揆又一次得到了湖北省的官费，到英国去留学。记得仲揆后来说过：“反对黎元洪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黎元洪对付我们不是用杀头的办法，而是把我们这些青年人象送瘟神那样送出去留学。”

留 学 英 国

一九一三年仲揆去英国留学时，同行共四人。当时给他们的路费和学费都是金条。他们四人先后到了上海，住在一个小旅店里。仲揆自告奋勇说：“我去银行兑换钱，你们去准备其它事情吧！”就把金条藏在衣袋里，到银行去兑换。那知银行的人看他穿得不好，怀疑金条是偷来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叫人把他扣起来，金条也没收了，说要等有人来保才能释放。仲揆说出了三个同行者的名字和住址，等他们三人来保时，仲揆已关了一天，也饿了一天了。行装准备好后，他把自

己的一份钱寄了一部分给家里，便和那三人同坐轮船到了英国。

刚到英国，仲揆找了一位老太太补习了一年英文，第二年考上了伯明翰大学预科，学采矿。两年后在选择本科时，他考虑到祖国地大物博，矿产丰富，可恨的是当时反动军阀政府只信任外国人，实权都掌在外国人手里，而中国人却只能当矿工。因此，他又改学了地质，立志学完后回国从事地质工作，以便中国人自己也能开发祖国宝藏。进了本科后，他学习得更加努力，除地质外还兼学了物理系的课程。这对他以后创立地质力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一七年，他考得了学士学位。在考试期间，他的小腿上长了一个脓疮，痛得不得了。为了节省看病的时间和医药费，他就自己用消了毒的刮胡子刀，咬紧牙关把脓疮和周围的烂肉都挖掉了。这个“手术”做完后，他的脸色苍白，满额都是冷汗，但仍在包扎好伤口后坚持去考试。考完后他再请医生上药时，英国医生都对他那惊人的意志表示钦佩。从此他的腿上就一直留下了一个大疤痕。

一九一九年春，仲揆得了硕士学位。他怀念祖国，不想再留在英国了。他的老师鲍尔敦劝他再作几年研究，得了博士学位再走。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他不愿在国外多耽搁时间，于是就抓紧时间到德国和法国参观、实习。在德国实习时，他做过矿工。到一九一九年秋末，他在法国正要回国时，接到伯明翰大学的老师鲍尔敦来电，转聘他去印度某矿当工程师。仲揆知道，去印度薪水高，可以帮助弟妹升学，但想到自己是中国人，应该为自己的祖国服务，他就拒绝了印度矿

场的聘请,决定按原计划回国。正值此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来电聘请他为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他接受了聘请即启程回国。回国途中,他为了要了解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就特地取道莫斯科,坐火车经过西伯利亚,于一九一九年底回到了祖国。

“破裤子先生”

回到祖国以后,仲揆就在北京与友人合租了一座四合院的房子。同住的有丁西林等人,都在北大教书。这时是一九二〇年春。

仲揆在北大任教,主课是岩石学。他教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教材经常补充新的内容。讲一堂课,往往要准备几小时,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学生上课听讲,记的笔记,都要亲自查看。如发现有的学生不理解他所讲的内容,他就把学生留下,单独给他解释,有时因此连吃饭都忘了。学生做毕业论文时,他都要逐个进行具体指导。学生常常在晚上到家里来请教他,他就和他们边吃饭边讨论。在论文写出初稿后,他要学生自己先反复修改后再由他修改,并指出修改的原因。他认为这样培养学生,可以使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进步更快些。

仲揆在生活上是很简朴的,当时很多教授都坐包车(人力车),他认为自己坐车,让别人拉着走是极不合理的。所以一直骑自行车。他对衣着很不讲究,有时裤子破了也不在乎。有的学生就开玩笑叫他“破裤子先生”。

仲揆任教一年后，看到北大校舍很不整齐，连一个大讲堂都没有，就向蔡元培先生提出自己兼职庶务主任，负责修整校舍。蔡先生同意后，他就把原来北大理学院后面的一个大殿，改修为一个大讲堂；把前面的院子修建成一个小花园，供学生散步休息；还把几间破旧的房子给学生改建成了洗澡间。大讲堂和洗澡间的钥匙由他亲自管理。

仲揆在国外留学期间，亲身感受到中国人受尽歧视的耻辱，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在上课时，除科学上的一些专用名词外，始终坚持用中文讲解。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一个学生叫他 Mr.李，叫了几声，他就问那个学生叫谁？那个学生说：“叫你”。仲揆说：“你可以称我老李、小李或者阿狗、阿猫，但是我不准你叫我 Mr.李。”有一次伪外交部打电话给北大二院（即理学院）说，有一个英国人要参观二院，要派一名教授介绍二院各系情况。仲揆当时是地质系主任，答应办理这件事。那个英国人带了一个翻译来到学校后，仲揆就陪他到所有的实验室去参观，并以中文介绍情况。那个英国人看见仲揆穿了一身旧西装，不象是一个教授，就用英语对翻译生气地说：“我要一个教授陪我，最好直接用英语谈话。”那翻译就对仲揆说：“是不是我们明天再来？可是要请一位能说英语的教授来陪。”仲揆说：“明天也是我。”那英国人知道了仲揆就是一位教授，不得不当场表示抱歉。

还有一次，仲揆带了七、八个学生到宜昌做野外工作，在街上看见一个美国人坐人力车到了目的地不给车钱，还要拿起手杖打拉车人。仲揆看得气愤极了，就跑到那美国人面前一定要他付车钱，并且不准他打人。那美国人开始楞了一下，

后来一看是一个穿破西服的中国人，竟蛮不讲理地冷笑一下，准备一走了之。仲揆和七、八个学生就拿起做地质工作的锤子把他拦住了。那个美国人一看事情不妙，只得乖乖地给了车钱，灰溜溜地走了。路上的行人都为此感到扬眉吐气。

我认识仲揆就在他任教北大期间。那是一九二〇年，我国某地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反动政府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于是很多学生和教授自动为救灾募捐，举办义务演出，我也参加了钢琴演奏。仲揆买了几张票，同朋友们一起去看了这次演出。仲揆在英国时就学过小提琴，回国后还经常练习，这是他一天劳累后最好的休息。可惜他拉小提琴时，没有人伴奏。那次演出后，经友人介绍我替他伴奏。当时，我在女师大教钢琴，在女附中教英文和法文。从此我们就经常见面了。过一段时间，仲揆对我说：“以后我不能练提琴了，没有时间。我要搞研究工作，我们以后就常通信吧。”那时他上午上课，下午教学生做试验，晚上自己做研究工作，而且经常在星期六下午带学生到北京附近野外实习，星期日晚上才能回来。他每个星期写一封信给我，主要是把他带领学生做野外工作的情况，写成几首诗寄给我。这些诗我一直保存着，可惜在抗日战争中失散了。

我们见面的机会愈来愈少，除了放假能见一、二次面，平时几乎是见不到的。这样共有两年的时间，谁都没有提过婚姻的事。有一次，仲揆忽然把他父亲给他的一封信给我寄了来，他父亲的信中说：“你既然和某人（指我）相识了两年，互相都很了解，你已经三十多岁了，如果她家中同意，就订婚吧。”但他自己没有表示什么意见。我征求我母亲和哥哥的意见，母

亲说虽然他家穷，弟妹多，但本人好就行，同意了。哥哥却嫌他家穷不同意。我自己经过两年相处，觉得他对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与人计较，但对原则问题，则丝毫不让；更主要的是他品德好，脾气好。因此，最后还是我自己同意了。

于是，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四日，在新租的一座小房子里，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蔡元培先生是主婚人。参加婚礼的只有比较熟识的朋友，在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便饭。这种简单的婚礼，在当时知识界是少见的。

在我们结婚的前一个月，仲揆的父亲不幸去世；在我们结婚的第二天，我母亲患脑溢血也去世了。因此，在我们新婚期间，没有什么欢乐的气氛。仲揆婚后第二天就上班了，我也没有请婚假，继续到学校教书。

在同年的十月三十一日，我生了一个女孩，现名李林。

我们结婚后，仲揆更是专心于地质科研工作。这时他正从事蜓科化石的研究，每天早上七点钟就去学校，有时工友忘了叫他吃饭，到下午两点钟还没有吃午饭；晚上家里不去叫他吃晚饭，就得九、十点钟才回来。回家后，每晚总得学习到半夜一、二点钟。有时为了考虑一个问题，常常在院子里来回地走，直到想出答案为止。这种情况不是偶而有之，而是经常如此。他每天一般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中午从不休息，但是精神仍然很好。

我住在医院生孩子时，他每天到晚上快九点才从学校来看我，可是还没有吃晚饭。到医院见到我，每次都只有两句话：“你昨晚睡好了没有？”“今天好吗？”然后就坐在那里写东